

中国移民经济收入的变化分析

王玉海

依据《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本文试图对中国迁移人口的经济收入进行初步分析，着重阐明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经济收入对移民行为影响的变化及在我国城镇体系中二者的不同相关形态。

本文将迁移定义为：跨越城镇行政区域，伴随户口变动或不变动户口但离开原居住地一年以上的移动行为。

一 经济收入与移民行为关系的变化

调查数据显示的是1978年和1986年两年样本人口的收入状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选取人均月收入1978年的70元和1986年的100元^①作为分界线，进行收入与移民的相关分析。^②

表1 1978年样本人口迁移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

	70元以下	70元以上
迁移人口	30 010 (A)	4 298 (B)
非迁移人口	39 987 (C)	3 891 (D)
合 计	69 997	8 189

为计算方便，将表1做相对处理得表2。

表2 1978年样本人口迁移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

	70元以下	70元以上	合计
迁移人口	42.87 (A)	52.49 (B)	95.36
非迁移人口	57.13 (C)	57.51 (D)	104.62
合 计	100	100	200

根据尤斯克理论，求表2的尤斯克系数（即相关系数，其中，x、y为变量）为：

$$Q_{xy} = \frac{BC - AD}{BC + AD} = \frac{52.49 \times 57.13 - 42.87 \times 47.51}{52.49 \times 57.13 + 42.87 \times 47.51} = 0.191$$

表3 1986年样本人口的迁移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

	100元以下	100元以上
迁移人口	25 800	9 592
非迁移人口	38 065	6 952
合 计	63 865	16 544

将表3做相对数处理后，求得尤斯克系数为 $Q_{xy} = 0.341$ 。

根据 Q_{xy} 值的含义，我们可以判断，在调查样本中，个人收入水平与迁移状况存在相关关系。1978年为低强度正相关，1986年为中强度正相关。所以，笔者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被调查的城镇人口迁移行为与个人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移民收入高于非移民收入。

第二，这种相关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后呈现由弱到强的趋势，即由1978年迁移者的收入稍稍高于非迁移者，变为1986年迁移者的收入较高于非迁移者。

第三，至今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978

① 这种分类没有固定标准，关键在于符合劳动者收入状况。一般来说，这个分界线的选取稍高于平均收入即可。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673页。

② 由于是定类数据，为简便起见，这里仅使用了四重表求尤斯克Q值的分析方法。

年为低强度正相关(0.191), 1986年为中强度正相关(0.341), 即经济收入对移民行为的作用程度并不显著。

下面对上述结论作出解释。世界移民发展过程表明, 影响迁移行为的动因很多, 但除宗教信仰及各种灾祸等极端原因促成的迁移外, 经济因素似乎是最主要的因素, 它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都对移民起着重要作用。而在经济因素中, 许多迁移动因又可归结为获得一定的或更高的收入。如美国1946、1963、1967三年的人口迁移原因调查表明, 以获得更好的收入为中心的经济原因均占三次调查迁移原因的50%以上^①。苏联由于人口迁移逐渐趋于自由, 经济收入因素对迁移行为的决定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了。所以, 我国人口迁移状况与收入水平存在相关关系是符合迁移发展一般规律的。道理很显然, 不管是变革型迁移还是保守型迁移, 从经济角度来说都是为了至少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而且, 调查样本表明, 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见表4)及其年龄构成都决定了他们比非

差别及地区工资差别都很小, 而且移民的所有制结构单一, 大多数为国营单位职工。所以, 直到1978年, 经济收入对移民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出来。对二者之间存在的低强度正相关关系所能给出的解释, 除上面提到的移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年龄结构的优势以外, 只能是旧经济体制下以全民所有制劳动者为主体的移民收入高出非移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是国家执行移民政策的一种辅助手段。也就是说, 为了完成统一制订的移民计划, 政府人为地提高了移民者的收入。那么, 到1986年我国移民状况与经济收入相关关系的加强, 显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变化的结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中国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劳动力市场出现萌芽, 使人口迁移初步走上了按资源配置规律进行的轨道, 移民构成不再以全民所有制劳动者为主体, 而是多种成份、多种目的的移动。

当潜在迁移者能按自身的迁移动机行事时, 收入机制必然开始发挥作用。正是由此, 才导致了我国改革以后收入与移民相关关系的加强。

就一般规律而言, 不发达经济阶段人口迁移与个人收入往往呈较强的相关关系, 从需求层次上也能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活动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动力的, 而获得较高收入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那么, 为什么中国的人口迁移从总体上看至今没有出现与经济收入的显著正相关呢? 我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还不存在全面就业竞争、全面人口自由流动, 以及全面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换言之, 我国还没有完成封闭型人口向开放型人口的转换, 劳动力市场虽出现萌芽, 但还处在分割状态。例如, 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背后, 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类人口的就业水平、工资水平及相应

表4 移民、非移民文化构成 (%)

	合计	情况不明	大学	大学肄业	高中	初中	小学	识字不多或不识字
移民	100	0.14	8.37	1.46	23.78	32.71	22.05	11.49
非移民	100	0.43	2.63	0.70	21.40	32.24	30	12.60

移民具备更强的经济能力。所以, 移民的收入高于非移民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至于我国1978年和1986年移民与收入相关状况的差距, 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特定环境造成的。一方面, 1978年以前, 中国的人口迁移具有超经济性特点, 迁移行为屈从于以户口制度为手段的统包统配政策, 有时甚至完全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这种做法从宏观上违反资源配置规律, 从微观上有悖于劳动者的个人意愿, 形成了我国长期的刚性迁移。另一方面, 我国的工资结构不合理, 劳动者工资

^① C.J.Lewis: Human migration, P118.

的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人口处在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保护之下，其就业状况和工资水平都优越于另一部分受限制的人口。如城市人口之间、全民与集体所有制人口之间，都存在着机会不平等现象。如图1所示，斜线D代表劳动力需求，直线S表示劳动力供给，虚线W代表工资（实际上是包括工资、福利、公共设施等在内的整体利益水平），中间围成的面积则是GNP。图1中，劳动力供给为 S_1 、工资水平为 W_1 ，GNP是AEBO；图2中，三种变量的值分别为 S_2 、 W_2 、CHMO。这时，全部GNP水平为AEBO + CHMO， $W_1 > W_2$ 。这种状况是靠经济力量之外的手段维持的，图2中的人口对图1中人口的工资水平可望而不可及。本来应为劳动力市场上暂短的现象，却表现为难以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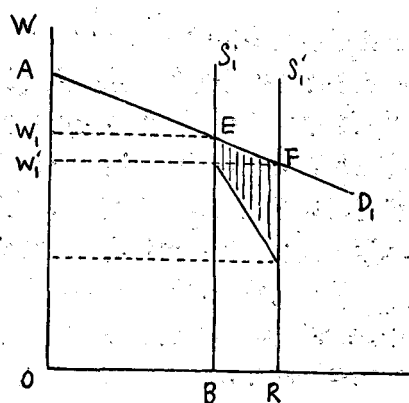


图1 享受政策优惠人口的就业工资和GN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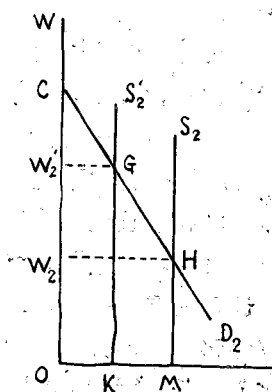


图2 受限制人口的就业工资和GNP

更的刚性结构。如果取消图1人口所享受的政策优惠权，图2中的人口会以 $W_1 > W_2$ 为动力，很快进入并且加大图1中的劳动力供给。流动完成后，图1中劳动力供给变为 S_1' ，工资变为 W_1' （ $W_2 < W_1' < W_1$ ），GNP水平为AFRO。图2中劳动力供给变为 S_2' ，工资水平为 W_2' （ $W_2' = W_1'$ ），CNP水平为CGKO。显然，全部人口的GNP值提高了（图1中阴影部分即为增加值）。更主要的是，通过竞争，全部人口的工资水平受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而趋于一致。得明显，这是一种简单抽象的关系。它以市场完全灵敏、流动毫无障碍为前提，达到了经济收益最大化。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削弱了各种工资就业障碍，但远远没有根除这些障碍，工资水平依然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供求状况，（即 W_1' 和 W_2' 还不相近）；限制人口迁移的各种政策性手段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所以，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收入增长对迁移行为作用的加强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二者相关程度不显著也是必然的。这种状况将会持续到新的迁移机制的全面确立为止。

二 不同类型城镇的移民收入状况比较

由于我国城市结构不平衡，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决定了人口迁移必然会对各类城市有明显的选择偏好。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镇五类城镇来说，如果自由迁移的话，人们对它们的选择偏好势必会由大到小递减。主要迁移方向，尤其是迁往何类城市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收入水平与人口迁往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什么联系？如有联系，前者对后者有无决定作用？下面我们通过分别求出的不同类型城镇1978年和1986年人口迁移与收入水平关系状况的Q指数（标准同前）进行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规模城市的迁移

人口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状况有明显的差别。

表5 不同类型城镇人口迁移与收入水平的相关状况

年份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镇
1978年	0.201	0.257	0.532	0.402	0.430
1986年	0.249	0.623	0.447	0.434	0.385

1978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二者呈现低强度的正相关,小城市和镇呈现中强度的正相关,只有中等城市呈现较强的正相关。1986年,二者在大城市相关程度最大,达0.623;在中小城市和镇呈现中强度正相关,在特大城市仍呈低强度相关。为了解释这种状况,应当分析移民迁入时的职业构成状况(见表6)。

表6 移民迁入时职业构成

	工人	农民	干部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其它在业人员	合计
特大城市	35.8	33.3	12.4	3.0	7.3	2.3	5.6	100
大城市	37.9	35.3	8.0	3.8	6.6	1.3	6.6	100
中等城市	31.7	33.8	17.1	3.3	7.6	1.7	4.8	100
小城市	34.0	31.5	16.0	4.5	6.4	2.7	4.9	100
镇	33.8	26.9	16.9	5.5	7.2	4.0	5.7	100

表6说明,除干部一栏外,各类城市和镇对大多数职业的迁移人口的吸收没有明显差别。中等城市对干部的容纳较其它城市为多,其次是镇,最少的是大城市。如果考虑到我国各职业存在的收入差别,那么,对比表5和表6我们会发现1978年不同类型城镇收入与移民的相关指数的排列顺序,与移民迁入时不同类型城镇对干部职业吸收比例的排列大致相同,而我国旧体制中干部的收入相对较高。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1978年我国中等城市移民的收入高于其它城市。1986年相关指数的排列所以比1978年有较大的变化,是由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决定的。仅就大城市的变化来说,这是因为:

第一,1978年以后,我国除正常城市化过程中迁进(许多人只是因建制的改变而取得城市户口,实际上没有变更居住地)城镇的少部分人口外。相当一部分人口的迁入属于回返性迁移,如大量知青返城、因落实政策返城及随迁等。这些人口迁入时,正是

中国就业矛盾最突出时期。在旧的劳动就业体制起主要作用的条件下,这些人的就业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经济上的边际效益往往为零甚至为负。即使如此,到1986年许多城镇仍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其中多数为落实政策而返城人员的家属中没有找到正常就业岗位者,他们的收入往往低于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而在迁入各类城镇人口的数量上,大城市1978~1986年迁入人口占总迁入人口的比重最小,也就是说,调查样本中,大城市比其它城市受由于就业困难而使移民收入减少的影响小。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工业企业的职工工资增长较快(1986年工资总额为1980年的214.8%),但这是就有固定职业的劳动者而言的。那些就业不充分人口的收入增长幅度显然没有这么大,这更拉大了不同就业状况人口的收入差距。而在就业不充分人口中,迁入人口占一定比例。所以,1978~1986年移民比例大的城镇,又要多承担劳动者收入增长幅度加大给移民带来的影响(下转第23页)

的根源是财产占有制度”^①。(4)马寅初说：我的《新人口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把马氏学说“送到坟墓里去”。(5)据美国人口情报社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表明，人口越贫穷，生殖力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人口翻番年数(年)
4000以上	300
2000以上	近100
200~400	27~30

高。马氏理论破产了。(6)爱德华兹在《农业展望》上说：“世界人口增长在慢慢下降，近十年人口增长了16%，而农业产量增长了19%。”^②马氏人口超过粮食供应的断言并没有得到证实。(7)1935年3月2日英国剑桥大学纪念马氏逝世100年大会上，除了

①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28日。

② 美联社华盛顿1987年9月9日电。

③ 安川正彬：《人口经济学》，第9页。

凯恩斯及其合作者赞成马氏外，“也就没有什么别人了”^③。(8)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0~1979年由25.95%降到11.66%；1986年以后出现回升，但40年仍少生两亿人；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22%的人口，这证明马氏学说在中国已破产。(9)马氏只研究人类文明阶段，既不懂原始社会，又未料到出现社会主义社会。南亮信奉的是典型的人口决定论，这种理论同战后日本发展背道而驰，南亮违背了研究理论须遵循“逻辑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南亮先生否定了不同社会制度现代人口史；现代社会不同制度人口史却又否定了南亮先生并进而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本文结论。

(本文责任编辑：杨子慧)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上接第18页)
响。

第三，到1986年，中国的不同类型城镇中，大中城市的失业率下降最快，而小城市和镇的就业问题却严重了，其失业率比全国2.9%的平均水平高，从而加大了上面的影响。

第四，1978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收入构成中工资占绝对成份，这时的干部收入要高于其它职业。1978年以后，人口的收入构成变化很大，单是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1986年总额就是1980年总额的345%，而干部除工资外的收入，一般只相当于同行业其它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平均数。这就减小了干部与其它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在大城市迁入人口中，干部职业比例变化最小，工人职业比例变化

最大。所以，从收入与职业各自变动所产生的结果来看，大城市移民的收入增长量也明显快于其它城市。

第五，长期居住人口中，以务工经商者居多，由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劳动和服务需求以及商品购买力大于中小城市和镇，务工经商的移民收入也会较高于其它城镇。

上面只是从大城市与其它城市比较中，分析了不同规模的城市移民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状况。虽然不同类型城镇的这种变化程度相差很大，如中等城市和镇的指数分别由0.532和0.430降低到0.447和0.385，但从整体移民来看，它们与收入水平的相关程度仍然加强了。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